

冯友兰：人生，觉解了吗

冯友兰：

人生，觉解了吗

冯友兰

—— 著

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冯友兰：人生，觉解了吗/冯友兰著. —北京：
人民出版社，2018. 7

(大师话人生)

ISBN 978-7-01-019044-0

I. ①冯… II. ①冯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
中国—现代 IV. ①I266. 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45242号

冯友兰：人生，觉解了吗

FENGYOULAN: RENSHENG, JUEJIE LE MA

冯友兰 著

责任编辑：李家晔

出版发行：人 民 出 版 社

地 址：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

邮 编：100706

邮购电话：(010) 65250042 65258592

网 址：<http://www.peoplepress.net>

印 刷：环球东方(北京)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：新华书店

版 次：2018年7月第1版 2018年7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：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
印 张：10

字 数：232千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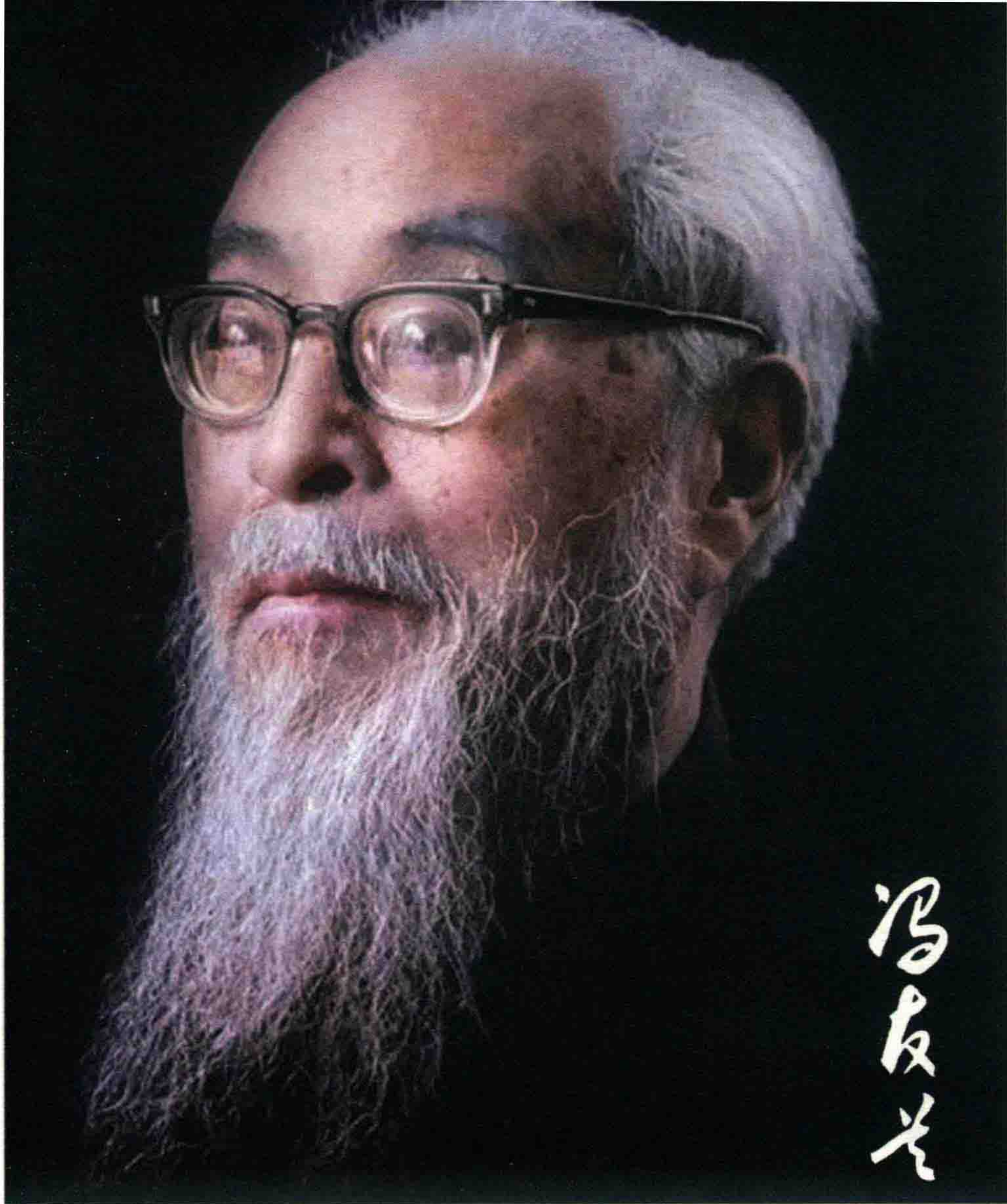
书 号：ISBN 978-7-01-019044-0

定 价：48.00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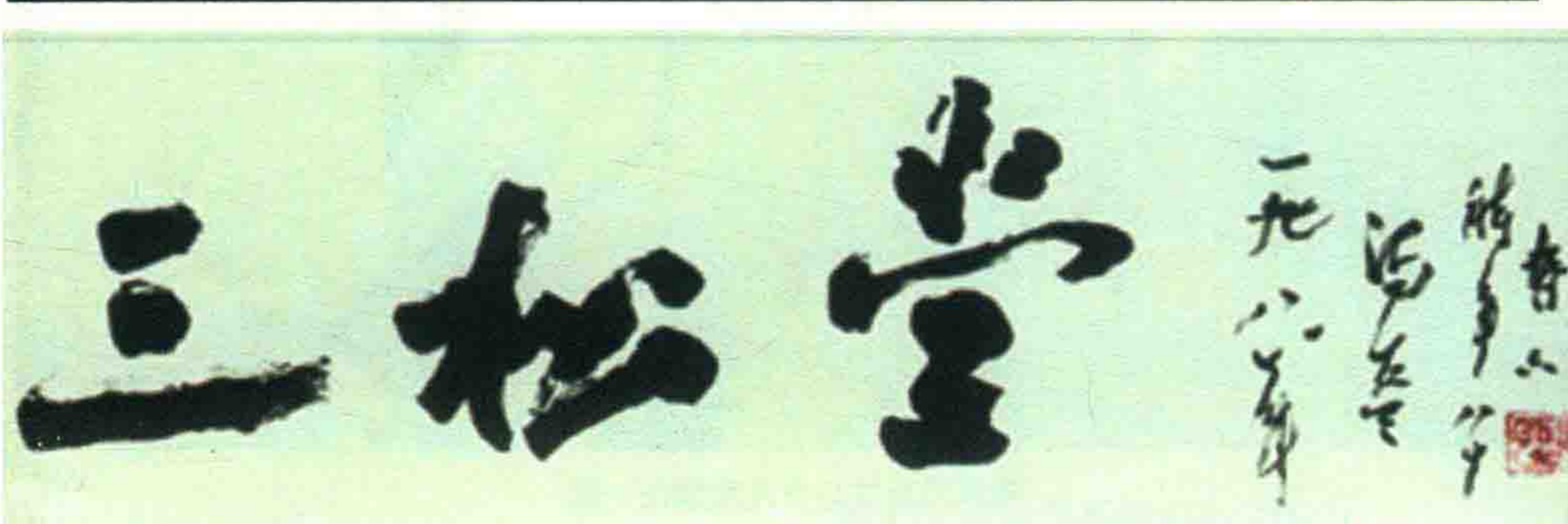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凡购买本社图书，如有印刷质量问题，我社负责调换

服务电话：(010) 65250042



冯友兰





Professor Fung Yu-Lan, Ph. D.

馮友蘭

1924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，回国后任清华大学教授



1920年冯友兰（右立者）与友人在纽约留学时合影



晚年冯友兰与女儿宗璞在一起



1963年毛主席接见冯友兰等教授

友兰先生：
 十月五日见面时。我们很欣
 迎人们进步的。像你这样的人过去
 犯过错误，现在准备改正错误，
 如军政实践，那是好的。也不必
 急于求效，可以慢慢地改，总以
 采取老实态度为宜。此覆。
 敬颂教祺！毛泽东
 十月十三日

清华大学
 冯友兰先生
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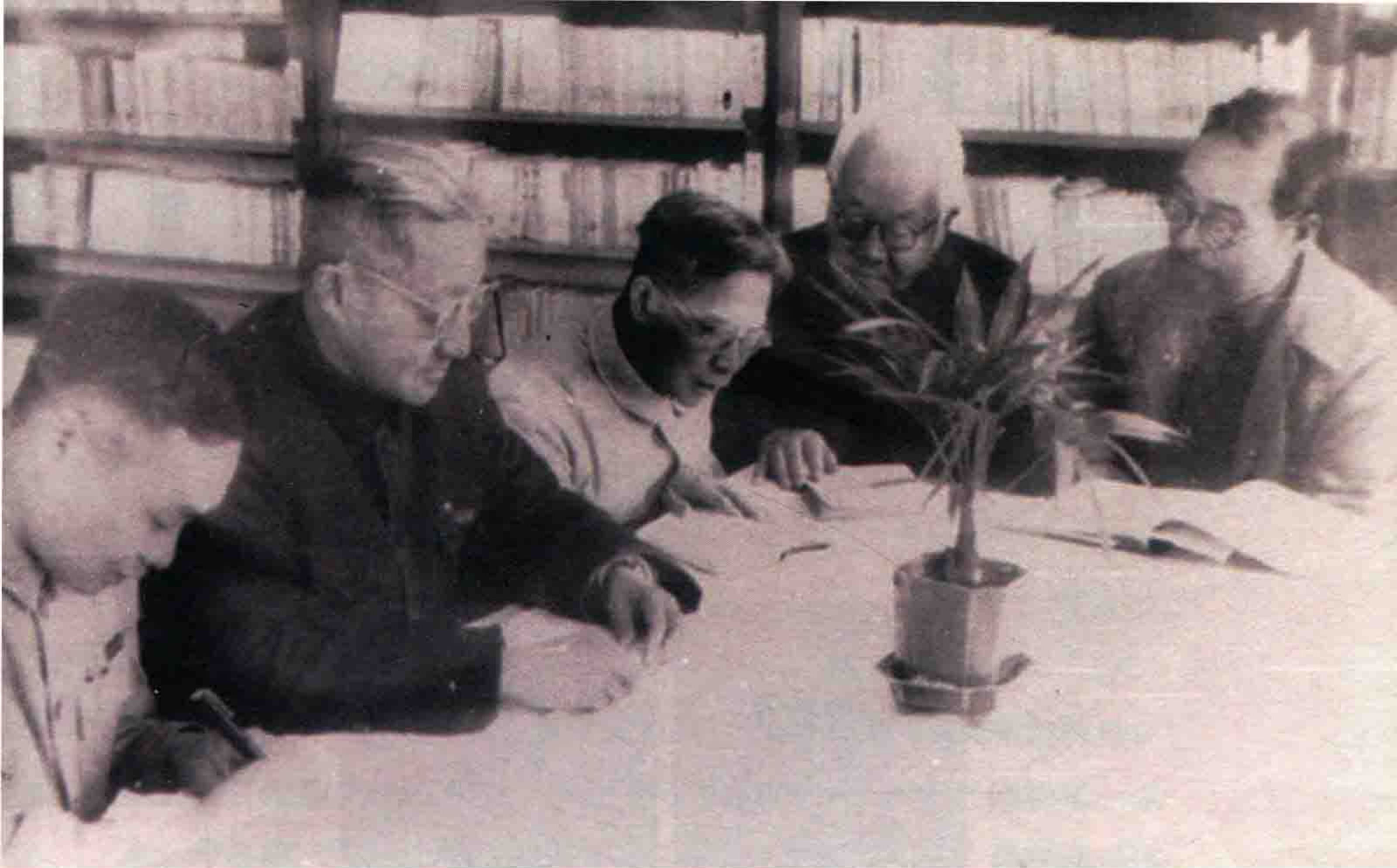
1949年毛泽东写给冯友兰的信



1941年清华大学校庆时校领导成员合影（右二冯）

九四八年八月五日國立清華大學外國語文學院
全體同仁慶祝陳福田先生執教五十二年紀念留影





20世纪50年代北大哲学系教师在研讨（右一冯）



1954年北大哲学系教师与苏联专家在未名湖合影（后左四冯）



修竹崇蘭靜觀其趣

宗勉先生雅屬

和風朗日足暢斯懷

友蘭壬午夏日朱西南



出版前言

本套《大师话人生》丛书总共八册，分别对应八位大师的作品，他们是：周作人、冯友兰、朱光潜、汪曾祺、沈从文、傅斯年、老舍、叶圣陶。本套丛书编选原则是：从人生哲学的角度，精选从民国至今在现当代文坛有着深远影响的著名文化大师的作品，内容主要是他们对人生的感悟、对世态的看法、对读书和治学的主张；文体主要是散文、随笔、杂记、评论、书信等。

大师品格，卓尔不群；大师精神，可以传世。春秋时鲁国大夫叔孙豹提出了“三不朽”精神——“立德”、“立功”、“立言”。

“立德”即树立道德典范；“立功”即为国为民建功立业；“立言”即提出真知灼见的主张。本套丛书要立的，正是这“三不朽”精神；要向读者传达的，正是大师们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忧国忧民的情怀。

品读《大师话人生》丛书，可以从大师那里汲取人生的智慧，反思自己的言行，修正自己的目标，认清前行的道路，正确地做人和做事。正可谓：读书可以立操守，读书可以享人生，读书可以治天下，是为本套丛书编选的宗旨。

由于时间仓促，编者能力有限，缺失和纰漏之处，敬请广大读者指正。

本册编辑说明

《冯友兰：人生，觉解了吗》是冯友兰先生的一部哲学随笔集，主题是关于哲学与心性、哲学与人生、处世方法、哲学与修养几个大问题，共分为四辑，分别阐述他对人生哲学的看法与见解，尤其是上升到觉解的高度，来理解人生，把握命运，指导生活。

本册编选时，选文主要依据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出版的《三松堂全集》（14卷），这套全集是经典版本，很好地遵守了原作的风貌，编校质量相当高。本册选文时，主体文章基本不做修改，原注、原编者注予以保留并标注清楚。新发现的问题有脚注形式给以说明。具体篇目中有类似于“本书、第三章、前一篇、上编”等词汇，是指原书的某个篇章，并已在具体篇目下标明。

本册书力图呈现作品面貌，为了读者阅读方便、丰富相关知识，对于原作中与现在通行译法不一致的人名、地名、物名等，统一了译名，并以注释的方式作了简要说明。其他瑕疵和编辑不恰当之处，敬请读者指正。

编者

自 传^①

(1980年作)

我名友兰，字芝生，汉族。我的原籍是河南省唐河县。祖上从山西省高平县来到唐河做一些小生意，后来就在唐河祁仪镇落户，成为地主。我的父亲于1898年中了清朝戊戌科的进士，后来在湖北做过知县。

我于1895年12月4日（公历）生于祁仪镇。幼年在家里的私塾里读书。1910年到开封入了中州公学的中学班。1912年到上海入了中国公学的大学预科班，1915年毕业。毕业后考上了北京大学的文科中国哲学门。从此，哲学，特别是中国哲学，就成了我的专业。

我在上海上学的时候，有一门课程是逻辑学。当时懂得逻辑的人很少。教师教我们读耶芳斯作的《逻辑学纲要》。这本书的内容他也没有全懂，只把它当成一本英文读本，教我们念英文。我就是自己摸索，并且照着书后面所附的练习题，自己练习。这当然不能使我完全懂得书的内容，但是我对于逻辑发生了深厚的兴趣，由此进一步发生了对于哲学的兴趣。

我认为逻辑学是哲学的入门，至少对于西方哲学是如此。有些人认为形式逻辑没有什么可以学的，三段论法的推理谁不会？有人还认为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是对立的。这些都是对于形式逻辑的误解。

无论如何，我对于哲学的兴趣是逻辑引起的。我对于哲学的入门，是逻辑引导的。以后我没有专门学逻辑，但是我对于逻辑的一知半解，帮助了我学哲学。

^① 选自《哲学文集（下）》，原载《文献》第九辑，1981年10月。

逻辑学引起了对于哲学的兴趣，这个兴趣当然引导我喜欢西方哲学。当我在1915年投考北京大学的时候，北大的章程上规定，有三个哲学门：中国哲学门、西洋哲学门和印度哲学门。实际上已经开的只有中国哲学门。据说1915年就要开西洋哲学门。当时我很高兴。可是入学以后，才知道西洋哲学门又开不成了。因为原来打算聘请的那位教授死了。在图书馆里有一书架英文书和德文书，据说是那位教授的遗物。就是这一架外文书，其中有一大部分还是关于宗教的。我没有办法，只得进了中国哲学门。

但是三年的学习，对于我以后的工作，还是很有用处的。这三年的学习使我知道，于三家村中所教的那些专为应付科举考试的东西之外，即专就中国方面说，也还有真正的学问。况且时在“五四”运动的前夕，在当时，北大的情况已经是“山雨欲来风满楼”了。这种“风”所给我的感染也是很大的。总的说，这三年中，我的收获是，开阔了眼界，增加了知识，练了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一些基本功。

我于1918年就毕业了。毕业后，在开封一个中等学校教书。在开封我同朋友们也办了一个刊物，名《心声》，宣传新文化。我也是“五四”时代的人；可是没有参加1919年“五四”那一天的运动，也没有看见那一天的盛况。一直到七八月间，我来北京参加当时教育部的留学考试，才看见了一些那一天的遗迹，听说了一些故事。

留学考试通过了，但因船期耽搁，12月才到纽约，次年初入了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院作研究生。这才有系统地学习西洋哲学。三年毕业，我作了一篇博士论文，这是三年学习的成绩。

这篇论文于1924年由商务印书馆用英文原文发表，题名为《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》。后来我用中文写出来，作为商务印书馆出版的《人生哲学》教科书，于1926年出版。《人生哲学》就是《人生理想

之比较研究》的中文本，只有最后两章是附加上去的。这两章是我于1923年写的一篇讲演稿。商务印书馆先已列入他们出版的《小百科全书》，题名为《一个新人生观》。《人生哲学》是我在20年代的主要著作。

我回国以后，本来想继续研究西方哲学史，作一些翻译介绍西方哲学的工作，当时的燕京大学叫我担任中国哲学史这门课，讲中国哲学。我在燕京讲，又在清华讲，多年积累，最后完成了我的那一部两卷本的《中国哲学史》，于1934年出齐。以后有朋友翻译成英文，在国外发表。这是我在30年代所作的重要著作。

我在40年代抗日战争时期，总共写了六部书：《新理学》（1939），《新事论》（1940），《新世训》（1940），《新原人》（1943），《新原道》（1945），《新知言》（1946）。

这六部书，实际上只是一部书，分为六个章节。这一部书的主要内容，是对于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生活的反思。凡是反思，总是在生活中遇见了什么困难，受到了什么阻碍，感到了什么痛苦，才会有的。如同一条河，在平坦的地上，它只会慢慢地流下去。总是碰到了崖石或者暗礁，它才会激起浪花。或者遇到了狂风，它才能涌起波涛。当时的狂风，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。

《新理学》这部书是我在当时的哲学体系的一个总纲。如果把六部书作为一部书看，《新理学》这部书应该题为第一章《总纲》。所以“新理学”这个名字，在我用起来，有两个意义：一个意义是指我在南岳、蒙自所写的，商务印书馆1939年所出的那部书；另外一个意义是指我在40年代所有的那个哲学思想体系。以下用不同的符号来表明这个区别。以《新理学》表明前者，以“新理学”表明后者。

当时写这六部书，并不是预先有个计划。只是遇到些问题或遇到

有些地方组稿而随时写的。可是毕竟写出来了。写出来以后，又好像是有一预定的计划，预写的大纲。那是因为写这些东西时，有一个总的目的，总的动力，那就是抗战。我的两卷本《中国哲学史》序文说：“此第二篇稿最后校改时，故都正在危急之中。身处其境，乃真知古人铜驼荆棘之语之悲也。值此存亡绝续之交，重思吾先哲之思想，其感觉当如人疾痛时之见父母也。吾先哲之思想有不必无错误者，然‘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’，乃吾一切先哲著书立说之宗旨。无论其派别为何，而其言之字里行间，皆有此精神之弥漫，则善读者可觉而知也，‘魂兮归来哀江南’；此书能为巫阳之下招软？是所望也。”这里所说的“重思”，就是上面所说的反思。

《新原人》的《自序》也可以说明这一点。《序文》说：“‘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’此哲学家所应自期许者也。况我国家民族值贞元之会，当绝续之交，通天人之际、达古今之变、明内圣外王之道者，岂可不尽所欲言，以为我国家致太平，我亿兆安身立命之用乎？虽不能至，心向往之。非曰能之，愿学焉。此《新理学》、《新事论》、《新世训》及此书所由作也。……昔尝以《新理学》、《新事论》、《新世训》为《贞元三书》。近觉所欲言者甚多，不能以三书自限，亦不能以四书自限。世变方亟，所见日新，当随时尽所欲言，俟国家大业告成，然后汇此一时所作，总名之曰《贞元之际所著书》，以志艰危，且鸣盛世。”所谓“贞元之际”，就是说，抗战时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时期。当时我想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了中国大部分领土，使当时的中国政府和文化机关都赶到西南角上。历史上有过晋、宋、明三朝的南渡，南渡的人都没有能活着回来的。可是这次抗日战争，中国一定要胜利，中华民

族一定要复兴，这次“南渡”的人一定要活着回来，这就叫“贞下起元”。这个时期就叫“贞元之际”。

西南联合大学的校歌是我作的。歌词（调寄《满江红》）说：

“万里长征，辞却了五朝宫阙。暂驻足，衡山湘水，又成离别。绝徼移栽桢干质，九洲遍洒黎元血。尽笳吹，弦诵在山城，情弥切。千秋耻，终当雪。中兴业，需人杰。便一成三户，壮怀难折。多难殷忧新国运，动心忍性希前哲。待驱除仇寇复神京，还燕碣。”

日本投降了。在西南联大解散，北大、清华、南开三校北返的时候，在西南联大的校址，立了一个纪念碑，碑文也是我作的。碑文简明地叙述了抗战及三校离合的经过，接着说：“缅维八年支持之苦辛，与夫三校合作之协和，可纪念者，盖有四焉。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，居东亚之天府，本应绍汉、唐之遗烈，作并世之先进。将来建国完成，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。盖并世列强，虽新而不古；希腊罗马，有古而无今。惟我国家亘古亘今，亦新亦旧，斯所谓‘周虽旧邦，其命维新’者也。旷代之伟业，八年之抗战，已开其规模，立其基础。今日之胜利，于我国家有旋乾转坤之功，而联合大学之使命与抗战相终始。此其可纪念者一也。文人相轻，自古而然。昔人所言，今有同慨。三校有不同之历史，各异之学风，八年之久，合作无间。同无妨异，异不害同。五色交辉，相得益彰。八音合奏，终和且平。此其可纪念者二也。万物并育而不相害，道并行而不相悖。小德川流，大德敦化，此天地之所以为大。斯虽先民之恒言，实为民主之真谛。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，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。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，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。违千夫之诺诺，作一士之谔谔。此其可纪念者三也。稽之往史，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，偏安江表，称曰南渡。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。晋人南渡，其例一也；宋人

南渡，其例二也；明人南渡，其例三也。‘风景不殊’，晋人之深悲；‘还我河山’，宋人之虚愿。吾人为第四次之南渡，乃能于不十年间，收恢复之全功。庾信不哀江南；杜甫喜收蓟北。此其可纪念者四也。联合大学初定校歌，其辞始叹南迁流离之苦辛，中颂师生不屈之壮志，终寄最后胜利之期望。校以今日之成功，历历不爽，若合符契。联合大学之终始，岂非一代之盛事，旷百世而难遇者者哉！爰就歌辞，勒为碑铭。铭曰：痛南渡，辞宫阙。驻衡湘，又离别。更长征，经峣嶲。望中原，遍洒血。抵绝徼，继讲说。诗书丧，犹有舌。尽茄吹，情弥切。千秋耻，终已雪。见仇寇，如烟灭。起朔北，迄南越。视金瓯，已无缺。大一统，无倾折。中兴业，继往烈。维三校，兄弟列。为一体，如胶结，同艰难，共欢悦。联合竟，使命彻。神京复，还燕碣。以此石，象坚节。纪嘉庆，告来哲。”校歌中的信念，在铭辞中成为实事。这就是“贞下起元”。

日本投降后，原来翻译我的《中国哲学史》的那位美国朋友，写信来说：他现在美国费城本薛文尼大学当教授。那个大学邀请我去当一年客座教授，一方面给学生讲中国哲学史，一方面同他合作，完成他的翻译工作。1946年暑假，我随同清华回到北京，实现了九年的心愿，随即从北京到费城。因为给学生上课，我用英文写了一部中国哲学史讲稿。这部讲稿，在我于1947年离开美国大陆的时候，交给纽约一家出版社出版，题名为《中国哲学小史》。这本书有法文和意大利文的翻译本，但没有中文本。差不多同时，我的《新原道》也由一位英国朋友翻译成英文，在伦敦出版，题名为《中国哲学之精神》。

在西方，研究古代文化的，有希腊学、埃及学等。研究中国文化的称为“中国学”。这些学都是把它们所研究的对象作为博物馆里的东西来研究，这也难怪。因为在解放以前，外国学者来中国的，中国